

东道国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

——国家文化的调节效应

焦 豪，朱浩璇，匡明慧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为基础整合多源数据，运用分层混合效应 logistic 回归，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国家文化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显著降低跨国公司选择独资模式进入的可能性，而东道国技术负担度则显著提升独资进入模式倾向，研究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调节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为政府构建数字友好型制度生态、跨国企业有效选择进入模式和合作治理方式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东道国；数字技术；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国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25)06-0001-19

引 言

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技术竞争白热化与数字经济浪潮三重力量交织，国际经贸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重塑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逻辑。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持续扩容，导致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遭遇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显现，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将在中国的部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等地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投资的关键载体，如何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进入模式决策，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国际化生存，更牵动东道国与母国间的技术博弈与利益分配格局(黄河，20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情境下中国企业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21&ZD139)，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化研究”(2024YZD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233200006、1233300010)

[作者简介] 焦豪(1983—)，男，河南驻马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平台战略和数字创新；朱浩璇(2000—)，男，安徽铜陵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平台战略和数字创新；(通讯作者)匡明慧(1999—)，女，山东日照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平台战略和数字创新

进入模式选择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进程中的核心决策,直接关系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海外经营风险,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既有文献主要关注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文化差异等宏观层面因素,以及聚焦于企业禀赋等微观层面因素对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宏观层面,现有研究关注东道国的政治腐败(薛求知和韩冰洁,2008)、市场风险(Zhao 等,2004)、市场潜力(Buccieri 和 Park, 2022),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Liou 等,2016),以及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Hennart, 1991)等因素对于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已有研究关注企业规模(蒋冠宏和蒋殿春,2017)、国际化经验(Johanson 和 Vahlne, 2002)、所有权性质(Cui 和 Jiang, 2012)和战略导向(Kim 和 Hwang, 1992)等产生的差异化影响。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为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带来全新机遇。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更依赖于运用数字技术和开发数据资源来创建数字平台以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焦豪,2023),推动跨国公司国际投资模式与路径发生深刻演变(詹晓宁和欧阳永福,2018)。跨国企业进入到东道国时,会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东道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李卫兵和张星,2023;焦豪等,2023),促进跨国公司与本地生态的协同,而数据主权规制、技术标准壁垒等新型交易成本可能迫使企业调整控制权配置策略(梅傲和潘子俊,2024)。此外,传统跨国经营风险(如制度摩擦与文化距离)与新兴数字原生风险(如数据主权冲突与算法治理失效)会形成复合风险架构(Luo, 2021)。这种由数字技术驱动的交易环境变革为跨国公司决策带来新的复杂性,亟须重新审视传统进入模式理论的解释边界。因此,本文所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在数字技术驱动的交易环境重构背景下,东道国数字技术如何系统性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

现有研究已经关注数字技术相关因素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一方面,有学者聚焦于数字技术对传统进入模式的改造:Monaghan 等(2020)发现数字原生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不再遵循传统“阶段式”扩张路径,而是通过网络平台、数据驱动和流程自动化,“跳跃式”进入外国市场;Stoian(2024)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摩擦,使企业从依赖传统中介转向直接出口模式,快速触达海外客户,为资源受限的中小企业提供了降低交易成本的新路径。另一方面,有学者探讨了数字技术驱动的进入模式创新:Nambisan 等(2019)认为,数字平台和生态系统通过改变资源组织逻辑与治理机制,催生了基于平台协同的非股权化、模块化进入模式创新;Brouthers 等(2022)提出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进入模式的选择逻辑,还产生了设立虚拟机构等非传统的进入模式。

然而,以往研究大多从数字技术赋能视角探讨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多关注微观层面的数字技术影响下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新特点,而较少涉及数字技术作为宏观因素在进入模式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大多将数字技术作为整体变量,而较少基于类型学视角探究数字技术的不同维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三是国家文化作为深度嵌入社会空间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忽略了国家文化对数字技术与进入模式选

择关系的调节作用。事实上,数字技术应用度和负担度,通过与交易成本中各要素的动态交互,可能重塑跨国公司对控制权的权衡逻辑,进而影响其进入模式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为基础整合多源数据,探究东道国数字技术如何系统性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以及国家文化的调节作用。本文边际贡献如下:一是突破对数字技术的单维认知,提出东道国数字技术环境中“应用度—负担度”的双重特征,拓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解构了国家文化对数字技术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系统阐释数字技术与文化特质的交互逻辑,丰富了技术与制度协同作用机制的理论内涵。

一、假说的提出

(一) 东道国数字技术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

交易成本理论为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决策提供了经典分析框架。Anderson 和 Gatignon (1986) 基于海外企业控制程度的差异,把进入模式分为“高控制”、“中控制”和“低控制”三类,认为进入模式选择是在不同控制程度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理性权衡。该理论认为,企业会通过交易属性、环境约束与战略目标的动态匹配,选择使“成本—风险—收益”三者边际均衡的进入模式。

关于国家或区域数字技术的现有研究大多将数字技术视为一个整体变量,探究互联网接入水平、移动电话使用情况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经济效益(赵涛等, 2020),少量研究关注到了东道国数字技术环境的类型学。例如,邱振宇等 (2025) 提出“数字制度距离”概念,认为东道国在数字领域的法律、治理规则等正式制度距离,以及用户参与模式、数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距离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创新活动。事实上,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内涵广泛,仅使用互联网使用率等技术因素难以准确衡量东道国的数字经济环境(刘友金等, 2024),尤其是各国数字技术使用成本的不同可能导致本地企业技术使用门槛的差异(孙晓华等, 2025)。这种“数字鸿沟”现象会深刻影响跨国公司与本土合作伙伴的协同效能。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技术可获得性角度,分析东道国数字技术的负担情况对跨国企业经营决策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与数字技术负担度切入,揭示其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机制。

数字技术应用度指的是数字技术对经济系统的渗透深度,体现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性以及市场主体的技术依赖度(张雪玲和焦月霞, 2017)。东道国的数字技术应用度越高,跨国公司独资进入的可能性越低。具体来说,一方面,在跨国公司嵌入本地数字生态的过程中,选择与本地伙伴进行合作能降低技术适配成本,同时快速满足高数字技术应用度市场中数据本地化存储、算法透明度等监管要求,减少法律违约成本(郭朝先等, 2024);另一方面,高水平的数字技术应用度可显著降低市场搜寻和履约成本,降低跨国公司与本地伙伴合作的风险(Stoian, 2024),同时本地合作伙伴掌握消费者偏好、平台规则等隐性知识,帮助跨国企业更好地构建竞争优势(唐露和刘伟, 2024)。

数字技术负担度反映了市场主体使用数字技术的成本壁垒(Afshar 等, 2020)。在负担度高的数字技术环境中, 跨国企业的技术垄断优势更为突出, 促使其选择独资进入模式提升自主决策权, 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获取市场份额。具体而言, 一方面, 东道国的数字技术负担度越高, 本地市场主体的数字认知与能力往往越滞后, 进一步加剧其与跨国企业之间的技术鸿沟(Ayanso 和 Lertwachara, 2015)。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模式赋予企业更高的战略决策自主权(Buckley 和 Casson, 1976), 能够自主设定核心技术标准、数据治理架构及服务定价体系, 避免因技术能力和认知差异而产生额外的协调与监督成本。另一方面, 在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越高的环境下, 数字技术配套制度尚不健全, 跨国公司的合资进入模式越可能因技术泄露、机会主义行为及契约执行困难等多重风险导致交易成本显著上升, 而独资模式能够有效规避合资经营中的技术扩散风险, 降低因合作伙伴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而产生的治理成本, 为跨国公司提供更稳定的经营环境。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

假说 1a 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越高,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的可能性越低;

假说 1b 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越高,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的可能性越高。

(二) 个人主义文化的调节效应

个人主义文化(Individualism)衡量了社会成员对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偏好程度, 高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自主性, 低个人主义文化则重视群体忠诚(Hofstede, 1984)。个人主义文化通过契约精神的刚性执行(Cline 和 Williamson, 2017)、制度透明性对政策偏差的抑制(Licht 等, 2007), 以及经济利益导向对非理性寻租的约束(Ball, 2001), 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与制度摩擦。因此, 本文认为, 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削弱跨国公司的独资进入倾向。具体来说:

第一, 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水平越高, 越容易接纳更新颖、更多元的新兴企业, 从而提升市场创新水平。个人主义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 激励个体追求高质量发展。例如, Shane(1993)认为, 个人主义排名更高的社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一方面, 个人主义文化放大数字技术应用度产生的技术溢出影响。高水平个人主义文化的东道国能够显著提升本土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本地创新生态系统(Santos 等, 2025); 另一方面, 个人主义文化削弱数字技术负担度产生的技术约束影响。高水平个人主义文化的东道国鼓励本土企业吸收跨国公司的专有技术, 削弱其技术垄断优势。因此, 跨国公司为更好地获取本地创新网络资源, 降低技术适配的制度摩擦, 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而非独资进入模式, 以更好地嵌入东道国的数字创新生态并实现协同发展。

第二, 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执行效率, 推动其基于市场逻辑而非裙带关系开展合作。一方面, 在数字技术应用度较高的东道国, 个人主义文化通过与数字生态形成互补效应, 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应用度对独资进入的负向影响。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强调契约精神的文化特质共同作用, 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王璐, 2013), 同时提升了对违约行为的惩戒效

力(Luo, 2002),使得技术合作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削弱了跨国公司选择独资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文化通过抑制本土合作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效缓解了数字技术负担度对交易成本的放大效应。在高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本地企业更强的责任履行意愿和声誉敏感性降低了合作风险,使合资模式的不可预测性显著下降,进而弱化了技术负担度对独资进入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说 2a 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越高,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与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之间的负向影响越强;

假说 2b 东道国的个人主义文化越高,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与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之间的正向影响越弱。

(三)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效应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衡量社会成员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容忍程度,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倾向于通过严格规则、风险规避和层级控制来减少不确定性,而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则更包容变化与创新(Hofstede, 1984)。高不确定性规避环境会强化企业在交易中对风险的敏感度,促使其通过提高控制权应对外部环境波动(Erramilli, 1996)。因此,本文认为,东道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能够强化跨国公司的独资进入倾向。具体来说:

第一,在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较高时,跨国公司的独资进入倾向降低,但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的风险规避倾向则通过以下路径抵消这一效应:一方面,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强化了技术接入壁垒,本地企业为避免核心数字资产的外溢风险而倾向于进行技术封锁,从而限制外资企业获取关键数字资源(Teece, 1986),导致跨国公司难以通过合作获取技术协同收益,放大了“外来者劣势”;另一方面,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带来了责任转嫁约束,本地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合同条款将技术风险单向转移至外资方,削弱了合作双方的信任基础,导致预期收益下行(Krishnan 等, 2006)。这些机制使数字技术本应降低的交易成本被非对称风险分配部分抵消,迫使跨国公司通过独资模式规避合作中的技术封锁和责任转嫁。

第二,在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较高时,跨国公司通过独资模式内部化交易风险,而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进一步强化这一倾向:一是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加剧风险承担的非对称分配。高数字技术负担度已显著抬高跨国公司的初始风险,而本地企业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下又要求外资企业承担超额风险,导致外部合作的预期损失逼近甚至超过内部化成本阈值,合作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Brouthers 和 Dikova, 2010)。二是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强化组织控制偏好造成的摩擦。层级控制与标准化管理流程契合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对风险抑制的诉求(Ouchi, 1979),但这与合作中的灵活性要求产生结构性矛盾,增加协调成本与治理摩擦。由此外部合作的风险—收益均衡点向内部化倾斜,进而强化数字技术负担度与独资进入的正向关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说 3a 东道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越高,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与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之间的负向影响越弱;

假说 3b 东道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越高, 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与跨国公司独资进入之间的正向影响越强。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通过合并多个国际数据库加工而成。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企业调查(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WBES)^①, WBES 数据涵盖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自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②、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③、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④、经济自由度数据(The Fraser Institute's Economic Freedom Dataset)^⑤以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数据(Cultural Dimensions Dataset)^⑥。

在样本选取上, 本文选择 2010—2022 年, 全球 112 个国家(地区), 涵盖宏观和微观层面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混合截面数据。数据处理步骤如下: 首先, 通过匹配调查年份和国家(地区), 将宏观层面变量前置一年, 与 WBES 数据合并。其次, 将 WBES 数据库中“外资持股比例”指标作为初选样本。随后, 对数据进行清理, 剔除外资持股比例在 10% 以下的样本。最后, 为了克服异常值的影响, 对部分连续变量在 1% 水平上做缩尾处理。剔除缺失值后, 最终得到 11 380 个样本观测值。

(二) 模型构建

由于研究样本涉及多个国家(地区)的企业数据, 同一国家(地区)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 因此选用分层混合效应 logistic 回归模型, 在控制了国家层面随机效应的情况下, 检验国家层面的数字技术对企业层面的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1)$$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fford + \beta_2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2)$$

①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https://www.enterprisesurveys.org/en/enterprisesurveys> (访问日期 2025-07-08)。

②资料来源: 国际电信联盟,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访问日期 2025-07-08)。

③资料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访问日期 2025-07-08)。

④资料来源: 世界治理指数,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访问日期 2025-07-08)。

⑤资料来源: 经济自由度指数, <https://www.efotw.org/economic-freedom/dataset> (访问日期 2025-07-08)。

⑥资料来源: 霍夫斯泰德文化数据, <https://geerthofstede.com/hofstedes-globe/> (访问日期 2025-07-08)。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Net_afford + \beta_3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3)$$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IDV \times Net_apply + \beta_3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4)$$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fford + \beta_2 \times IDV \times Net_afford + \beta_3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5)$$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Net_afford + \beta_3 \times IDV \times Net_apply + \beta_4 \times IDV \times Net_afford + \beta_5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6)$$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UAI \times Net_apply + \beta_3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7)$$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fford + \beta_2 \times UAI \times Net_afford + \beta_3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8)$$

$$Entrymode_{ij} = \beta_0 + u_j + \beta_1 \times Net_apply + \beta_2 \times Net_afford + \beta_3 \times UAI \times Net_apply + \beta_4 \times UAI \times Net_afford + \beta_5 \times controls + \varepsilon_{ij} \quad (9)$$

式(1)至式(3)用于考察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与负担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式(4)至式(6)、式(7)至式(9)分别用于考察东道国个人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效应。其中,下标*i*表示跨国公司,*j*表示跨国公司所在国家(地区),*u_j*是截距项的国家分层随机效应, β_0 为常数项,*controls*为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 ε_{ij} 为随机扰动项。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跨国公司进入模式。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分为非股权进入方式与股权进入方式,本文选用股权进入方式探讨跨国公司对于控制权的配置与权衡。子公司外商直接投资与否的持股比例临界点是10%(Padmanabhan和Cho,1999),而其是否为独资企业的持股比例临界点为95%(Hennart,1991; Padmanabhan和Cho,1999)。本文采用WBES题项“外国私营部门拥有的公司百分比”作为判断依据,如果数值大于95%认为是独资模式进入,取值为“1”,数值在10%至95%之间则取值为“0”。

2. 解释变量

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借鉴张雪玲和焦月霞(2017)的做法,本文使用ITU数据库中“在过去3个月内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比例”的取值进行测量。

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借鉴Ayanso和Lertwachara(2015)的做法,本文使用ITU数据库中“基础固定宽带服务组合资费占人均国民收入比重”的取值进行测量。

3. 调节变量

个人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本文借鉴Hofstede(1984)的国家文化数据来衡量个人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1)投资规模。使用 WBES 题项“公司全职员工数”并取对数进行测量。(2)研发投入。使用 WBES 题项“是否有研发支出”测量，如果回答为“是”则取值为“1”，回答为“否”则取值为“0”。(3)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使用 WDI 数据库中“人均 GDP”进行测量。(4)东道国人口规模。使用 WDI 数据库中“总人口”并取对数进行测量。(5)东道国经济自由度。使用经济自由度数据库中的取值进行测量。(6)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使用 WDI 数据库中“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测量。(7)东道国政府效率。使用 WGI 数据库中的取值进行测量。(8)东道国腐败控制。使用 WGI 数据库中的取值进行测量。(9)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使用 WGI 数据库中的取值进行测量。(10)东道国监管质量。使用 WGI 数据库中的取值进行测量。此外，考虑到行业差异和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维度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跨国公司进入模式	跨国公司层面	<i>Entrymode</i>	外资持股大于 95% 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应用度	东道国层面	<i>Net_apply</i>	互联网的使用比率
	数字技术负担度		<i>Net_afford</i>	基础固定宽带服务组合资费占人均国民收入比重
调节变量	个人主义文化	东道国层面	<i>IDV</i>	对个体目标的偏好程度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		<i>UAI</i>	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容忍程度
控制变量	投资规模	跨国公司层面	<i>Size</i>	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全职员工数，取对数
	研发投入		<i>RD</i>	虚拟变量，如果引进新技术/流程/方法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层面	<i>GDP</i>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万美元)
	人口规模		<i>Population</i>	人口规模，取对数
	经济自由度		<i>IEF</i>	经济自由度指数
	贸易开放度		<i>Trade</i>	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政府效率		<i>GE</i>	政策执行与公共服务质量
	腐败控制		<i>CC</i>	遏制公权滥用的程度
	政治稳定性		<i>PV</i>	政权非正常更迭风险
	监管质量		<i>RQ</i>	法规制定的科学与合理性

三、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表2的回归结果揭示了东道国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列(2)模型单独引入数字技术应用度时,其系数为-1.154,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降低了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的可能性;列(3)模型单独引入数字技术负担度时,其系数为0.619,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技术负担度提升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的可能性;列(4)

表2 东道国数字技术应用度和负担度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i>Net_apply</i>	—	-1.154 *** (0.349)	—	-0.941 *** (0.361)
<i>Net_afford</i>	—	—	0.619 *** (0.213)	0.456 ** (0.223)
<i>Size</i>	0.042 *** (0.015)	0.042 *** (0.015)	0.043 *** (0.015)	0.043 *** (0.015)
<i>RD</i>	-0.264 *** (0.050)	-0.265 *** (0.050)	-0.267 *** (0.050)	-0.267 *** (0.050)
<i>GDP</i>	-0.001 (0.072)	0.051 (0.073)	0.002 (0.070)	0.043 (0.072)
<i>Population</i>	-0.106 * (0.063)	-0.141 ** (0.063)	-0.104 * (0.061)	-0.133 ** (0.063)
<i>IEF</i>	0.183 (0.123)	0.249 ** (0.125)	0.175 (0.121)	0.230 * (0.124)
<i>Trade</i>	-0.139 (0.179)	-0.187 (0.178)	-0.128 (0.174)	-0.171 (0.175)
<i>GE</i>	0.361 * (0.195)	0.608 *** (0.208)	0.474 ** (0.197)	0.650 *** (0.209)
<i>CC</i>	0.057 (0.179)	-0.012 (0.179)	-0.003 (0.177)	-0.044 (0.178)
<i>PV</i>	0.159 (0.108)	0.119 (0.108)	0.150 (0.106)	0.119 (0.108)
<i>RQ</i>	-0.187 (0.197)	-0.262 (0.198)	-0.150 (0.195)	-0.220 (0.198)
国家层面截距方差	0.508 *** (0.089)	0.497 *** (0.087)	0.468 *** (0.083)	0.476 *** (0.084)
常数项	1.417 (1.392)	1.813 (1.389)	1.322 (1.361)	1.682 (1.37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国家(地区)数	112	112	112	112
Log likelihood	-7 146	-7 140	-7 142	-7 138
LR test	686.8 ***	646.9 ***	646.6 ***	635.6 ***
Wald test	221.0 ***	231.8 ***	231.2 ***	236.7 ***

注: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模型在同时纳入两个解释变量时，系数符号和列(2)、列(3)保持一致，分别通过 1%和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稳定在-7 146~-7 138 区间，且随着核心解释变量的引入呈现系统性改善趋势，表明变量体系的扩展有效提升了模型解释力；Wald 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模型可靠性，其统计量在 221.0~236.7 区间，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说 1a 和假说 1b 得以验证。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估计模型

考虑到行业内部可能存在未观测的异质性，本文在原两层混合效应模型(国家—企业)的基础上嵌套行业随机效应，构建三层混合效应模型(国家—行业—企业)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替换估计模型后的结果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3 替换估计模型后的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i>Net_apply</i>	—	-1.058 *** (0.348)	—	-0.815 ** (0.360)
<i>Net_afford</i>	—	—	0.650 *** (0.211)	0.506 ** (0.2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国家(地区)数	112	112	112	112
Log likelihood	-7 098	-7 093	-7 093	-7 090
LR test	789.2 ***	750.1 ***	751.6 ***	740.1 ***
Wald test	209.8 ***	218.9 ***	221.4 ***	225.2 ***

2.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具体来说，一是将独资模式判定的阈值从 95%放宽至 90%，重新构造二元变量：外资控股大于 90%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基于此新变量，在两层混合效应模型中进行回归。二是为了更严格地检验定义的稳健性，将独资模式阈值设定为 100%，重新构造二元变量：外资控股等于 100%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基于此新变量，在两层混合效应模型中进行回归。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替换独资模式阈值的检验结果

项目	独资模式阈值替换为 90%				独资模式阈值替换为 100%			
	(1)	(2)	(3)	(4)	(5)	(6)	(7)	(8)
<i>Net_apply</i>	—	-1.128 *** (0.349)	—	-0.928 ** (0.362)	—	-1.146 *** (0.341)	—	-0.914 *** (0.353)
<i>Net_afford</i>	—	—	0.589 *** (0.213)	0.428 * (0.223)	—	—	0.646 *** (0.207)	0.485 ** (0.2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国家(地区)数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112
Log likelihood	-7 117	-7 112	-7 114	-7 110	-7 193	-7 187	-7 188	-7 185
LR test	702.5 ***	668.8 ***	663.7 ***	656.2 ***	609.3 ***	558.1 ***	563.7 ***	546.8 ***
Wald test	223.7 ***	234.0 ***	233.3 ***	238.5 ***	204.8 ***	216.1 ***	217.2 ***	222.5 ***

3. 联合固定效应

为了进一步排除行业一年份交互效应的潜在干扰，本文对基准模型的固定效应设置进行了扩展与调整。具体而言，在原模型中分别纳入的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被替换为行业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以更充分地捕捉不同行业在不同年份所对应的共同影响因素，结果如表 5 所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符号上与基准模型高度一致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研究结论不依赖于固定效应的具体设置，原有结论得到支持。

表 5 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后的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i>Net_apply</i>	—	-1.194 *** (0.350)	—	-0.992 *** (0.363)
<i>Net_afford</i>	—	—	0.603 *** (0.213)	0.431 * (0.2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行业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国家(地区)数	112	112	112	112
Log likelihood	-7 132	-7 126	-7 128	-7 124
LR test	675.9 ***	635.2 ***	638.1 ***	625.6 ***
Wald test	245.3 ***	256.6 ***	255.0 ***	260.9 ***

4. 工具变量

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借鉴 Lewbel(1997)的做法，针对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应用度与数字技术负担度，分别构造平方项作为工具变量($IV_1 = Net_apply \times Net_apply$ ， $IV_2 = Net_afford \times Net_afford$)。其有效性基于以下逻辑：第一阶段回归中 IV_1 与 IV_2 的系数分别为 0.997 和 0.483，均在 1%水平上显著，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p 值为 0.000，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且 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远超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通过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表 6 列(2)和列(4)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内生性后，数字技术应用度和数字技术负担度的系数与基准模型方向一致，均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主要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变化。

表 6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i>Net_apply</i>	<i>Entrymode</i>	<i>Net_afford</i>	<i>Entrymode</i>
<i>Net_apply</i>	—	-0.192 *** (0.037)	—	—
IV_1	0.997 *** (0.004)	—	—	—
<i>Net_afford</i>	—	—	—	0.126 *** (0.027)
IV_2	—	—	0.483 *** (0.012)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 380	11 380	11 380	11 380
Kleibergen-Paap rk LM	—	3 050.66 *** [0.000]	—	116.142 ***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	55 000.44 {16.380}	—	1 681.573 {16.380}

注：() 内为稳健标准误，[] 内为 P 值，{ } 内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 调节效应检验

表 7 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文化维度显著调节数字技术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列(1)中数字技术应用度与个人主义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 -0.088，且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列(2)中数字技术负担度与个人主义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 -0.625，且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列(3)模型同时纳入数字技术应用度和数字技术负担度，两个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列(1)、列(2)

保持一致,且均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对数似然值、Wald 检验均表明模型具备统计可靠性。因此,假说 2a 和假说 2b 得以验证。同理,列(4)中数字技术应用度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 0.107,且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列(5)中数字技术负担度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 0.519,且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列(6)模型同时纳入数字技术应用度和数字技术负担度,两个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列(4)、列(5)保持一致,分别通过了 5%和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假说 3a 和 3b 得到支持。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文化维度的调节效应,列(7)在构建完整模型的同时纳入了四个交互项,结果表明交互项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前述模型基本一致。这进一步支持了假说 2a、假说 2b、假说 3a 和假说 3b。

表 7 东道国个人主义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7)
<i>Net_apply</i>	-1.305 (1.085)	—	1.063 (1.177)	-11.577 *** (3.525)	—	-7.641 *** (2.513)	-3.648 (2.805)
<i>Net_afford</i>	—	-7.232 (5.422)	5.467 (6.094)	—	-58.819 *** (11.825)	-61.430 *** (12.431)	-41.634 ** (17.944)
<i>Net_apply</i> × <i>IDV</i>	-0.088 *** (0.028)	—	-0.124 *** (0.029)	—	—	—	-0.118 *** (0.031)
<i>Net_afford</i> × <i>IDV</i>	—	-0.625 *** (0.210)	-1.120 *** (0.248)	—	—	—	-0.685 ** (0.303)
<i>Net_apply</i> × <i>UAI</i>	—	—	—	0.107 ** (0.044)	—	0.070 ** (0.032)	0.061 * (0.033)
<i>Net_afford</i> × <i>UAI</i>	—	—	—	—	0.519 *** (0.142)	0.612 *** (0.153)	0.519 *** (0.181)
<i>IDV</i>	0.073 *** (0.026)	-0.001 (0.010)	0.111 *** (0.027)	—	—	—	0.095 *** (0.030)
<i>UAI</i>	—	—	—	-0.057 * (0.032)	-0.006 (0.009)	-0.054 ** (0.025)	-0.051 * (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 489	6 489	6 489	6 489	6 489	6 489	6 489
国家(地区)数	54	54	54	54	54	54	54
Log likelihood	-3 895	-3 889	-3 875	-3 894	-3 886	-3 879	-3 870
LR test	403.2 ***	431 ***	442.1 ***	402 ***	390.3 ***	378.9 ***	372.5 ***
Wald test	229.2 ***	227.7 ***	250.3 ***	219.8 ***	222.6 ***	229.5 ***	244.6 ***

(四) 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揭示东道国数字技术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从国家发展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两个方面进行分组检验(见表 8)。

第一,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 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组, 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中, 数字技术应用度和负担度的系数均显著且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 但在发达国家(地区)样本中, 两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当跨国公司选择发展中国家(地区)作为投资目的地时对其数字技术环境更加敏感。这一差异暗示了制度成熟度的缓冲作用: 发达国家(地区)健全的法律体系与市场化机制降低了企业对东道国数字环境的依赖性; 发展中国家(地区)制度缺口的普遍存在放大了数字技术的治理压力, 迫使企业将数字技术评估作为进入决策的依据。

第二, 根据是否有研发投入进行分组检验, 发现在无研发投入的子公司样本中, 数字技术应用度和负担度的系数均显著且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 而有研发投入的子公司样本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相关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有研发投入的子公司可通过母公司技术转移等方式构建内部知识冗余, 形成对东道国数字技术条件的替代能力, 削弱了外部技术约束的决策权重, 而无研发投入的子公司因缺乏内部技术储备, 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数字技术条件的制约, 需要将东道国数字技术环境作为决策依据之一。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项目	发达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地区)	有研发投入	无研发投入
	(1)	(2)	(3)	(4)
<i>Net_apply</i>	-3.308 (2.328)	-0.902** (0.459)	-0.400 (0.526)	-0.963** (0.418)
<i>Net_afford</i>	-21.375 (20.959)	0.441* (0.230)	0.186 (0.319)	0.588** (0.2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527	8 853	3 193	8 187
国家(地区)数	25	87	110	112
Log likelihood	-1 518	-5 595	-2 032	-5 092
LR test	1.334	510.9***	63.27***	547.2***
Wald test	90.71***	204.6***	114.3***	177.0***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为基础整合了多源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数字技术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并揭示了国家文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数字技术的应用度与负担度显著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决策。数字技术应用度越高,跨国公司选择独资进入的可能性越低,因其成熟的数字生态降低了合作风险与适配成本;数字技术负担度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独资模式以规避高运营成本与技术适配风险。(2)国家文化塑造技术效应的边界条件。高个人主义文化通过制度透明性与契约执行力,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度与独资进入的负向关系,同时弱化技术负担度的正向影响;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则通过风险转嫁倾向与组织控制偏好,削弱数字技术应用度的负向作用,并加剧技术负担度对独资模式的驱动效应。

(二) 理论贡献

本文具有两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基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视角,拓展了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前因研究。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制度和市场等宏观因素(薛求知和韩冰洁,2008; Zhao等,2004; Buccieri和Park,2022),以及企业能力等微观因素(Monaghan等,2020; Nambisan等,2019)对于跨国公司进入策略的影响,但关于东道国的数字技术环境如何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尚未进行充分探讨。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东道国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具有“应用度—负担度”的双重特征,将其作为核心前因引入进入模式选择模型,揭示了两者对不同进入模式的差异性驱动效应。这一发现不仅扩展了Anderson和Gatignon(1986)经典模型在数字时代的解释边界,更推动理论认知从“技术工具”向“技术环境”的跃迁,为解析数字技术的影响提供了辩证性思考。

第二,本文解构国家文化对数字技术效应的调节逻辑,探究了数字技术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关系的边界条件。文化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战略的重要变量,现有研究多关注文化距离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直接效应(Hennart,1991; Brouthers,2002),却鲜有研究探讨文化特质如何重塑数字技术环境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路径。本文以个人主义与不确定性规避两大文化维度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国家文化如何调节数字技术应用度和负担度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将Hofstede(1984)的文化维度延伸至数字经济场景,为数字时代的跨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坐标;另一方面,系统阐释数字技术与文化特质的交互逻辑,丰富了技术与制度的协同作用机制的理论内涵,为后续更多边界条件的探索奠定基础。

(三) 管理启示

第一, 构建数字友好型制度生态。一方面, 要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提升数字网络覆盖率、数据算力水平和平台兼容性等方面, 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引导跨国企业与本地运营商共建数字基础设施, 通过技术标准互认降低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壁垒, 缓解“数字鸿沟”对跨国合作的制约, 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可负担的技术适配环境。另一方面, 要优化外资准入的差异化规制, 关注政策设计与本地数字技术成熟度之间的动态匹配: 对于数字应用度较低的初级市场, 可放宽外资持股限制, 鼓励跨国公司技术嵌入合作带动本地数字化能力建设; 对于技术负担度较高的市场, 可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政策, 或建立数字技术专项基金缓解技术适配成本。

第二, 构建数字技术“环境评估—适配创新”的双循环决策体系。在进入模式选择阶段, 建立对东道国数字技术的评估框架, 考虑将应用度和负担度等作为核心决策变量, 通过分析不同模式下的“成本—收益—风险”结构, 识别最优的进入模式。在进入后运营阶段, 通过技术适配性创新构建竞争优势, 对于高负担度市场, 应优先开发轻量化、低耦合的技术解决方案, 例如采用边缘计算架构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 或设计离线功能模块应对网络不稳定性; 对于高应用度市场, 则需强化数据整合与接口兼容能力, 通过 API 标准化接入本地平台, 快速融入既有数字价值链, 由此降低对东道国数字技术环境的依赖, 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东道国数字生态的战略升级。

第三, 构建基于文化特征的差异化治理架构。跨国公司需依据东道国文化特质重构合作治理逻辑: 在高个人主义文化市场场景中推动契约的精细化管理, 例如在协议中嵌入可量化的技术贡献指标, 并关联股权分红比例,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履约过程全链条可追溯; 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市场场景中进行风险对冲设计, 例如要求本地合作伙伴按持股比例缴纳技术适配保证金、采用分阶段注资模式, 从而构建透明、可追责且具有韧性的跨国合作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郭朝先, 李婷, 罗芳. 数据跨境流通规则博弈与中国应对[J]. 中国流通经济, 2024, 38(9): 27-38.
- [2] 黄河.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J]. 国际观察, 2017(6): 122-136.
- [3] 蒋冠宏, 蒋殿春.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J]. 世界经济, 2017(7): 128-148.
- [4] 焦豪. 数字平台生态观: 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理论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7): 122-141.
- [5] 焦豪, 崔瑜, 张亚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高技能创业人才吸引[J]. 经济研究, 2023, 58(12): 150-166.
- [6] 李卫兵, 张星.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交易成本[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7(6): 8-17.
- [7] 刘友金, 张颖斌, 蔡翔. 从技术鸿沟到技术追赶: 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4, 59(11): 192-208.

- [8]梅傲, 潘子俊. 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治理模式、难题审视及合规进路[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4, 47(6): 60-67.
- [9]邱振宇, 刘志阳, 赵陈芳. 数字创新国际化策略: 基于数字制度距离的分析框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5, 47(3): 3-18.
- [10]孙晓华, 马雪娇, 孔一杰, 等. 中国制造业的数字鸿沟——“接入—应用—转化”的分析框架[J]. 管理世界, 2025, 41(4): 38-58.
- [11]唐露, 刘伟. 企业全球研发网络的治理新机制——总部技术外派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整合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4, 40(1): 135-155.
- [12]王璐. 论投资条约中的“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兼论我国在中美投资条约谈判中的立场选择[J]. 法商研究, 2013, 30(1): 120-126.
- [13]薛求知, 韩冰洁. 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4): 88-98.
- [14]詹晓宁, 欧阳永福. 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 管理世界, 2018, 34(3): 78-86.
- [15]张雪玲, 焦月霞.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4): 32-40+157.
- [16]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10): 65-76.
- [17]AFSHAR A M, ALAM K, TAYLOR B. Incorporating Affordability,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n the ICT Development Index: Implications for Index Building and ICT Policy-making[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20, 36(2): 71-96.
- [18]ANDERSON E, GATIGNON H. Modes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7: 1-26.
- [19]AYANSO A, LERTWACHARA K. An Analytics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ICT Development and Affordability[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5, 32(4): 389-398.
- [20]BALL R.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1, 573(1): 57-84.
- [21]BROUTHERS K D.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Transaction Cost Influences on Entry Mode Choice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 203-221.
- [22]BROUTHERS K D, CHEN L, LI S, et al. Charting New Courses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 Conceptualiz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n Non-traditional Entry Mod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2, 53(9): 2088.
- [23]BROUTHERS K D, DIKOVA D. Acquisitions and Real Options: The Greenfield Alterna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6): 1048-1071.
- [24]BUCCIERI D, PARK J E.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and Reconfiguration towards Post-entry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rket Dynamism and Entry Mod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48: 89-100.
- [25]BUCKLEY P J, CASSON M C.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 Macmillan, 1976.
- [26]CLINE B N, WILLIAMSON C R.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7, 46: 284-306.
- [27]CUI L, JIANG F. State Ownership Effect on Firms' FDI Ownership Decis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invest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3): 264-284.
- [28]ERRAMILI M K. Nationality and Subsidiary Ownership Pattern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 225-248.

- [29] HENNART J F.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Management Science*, 1991, 37(4): 483-497.
- [30]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4.
- [31]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8(1): 23-32.
- [32] KIM W C, HWANG P. 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 Entry Mode Choi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 29-53.
- [33] KRISHNAN R, MARTIN X, NOORDERHAVEN N G. When does Trust Matter to Allianc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5): 894-917.
- [34] LEWBEL A. 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97: 1201-1213.
- [35] LICHT A N, GOLDSCHMIDT C, SCHWARTZ S H. Culture Rule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other Norms of Governanc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7, 35(4): 659-688.
- [36] LIOU R S, CHAO M C H, YANG M. Emerging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Assess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on Ownership Strategy[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51(4): 600-611.
- [37] LUO Y. Contract, Co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10): 903-919.
- [38] LUO Y. A General Framework of Digitization Risk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 53(2): 344.
- [39] MONAGHAN S, TIPPMANN E, COVIELLO N. Born Digitals: Thoughts on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 11-22.
- [40] NAMBIAN S, ZAHRA S A, LUO Y. Global Platforms and Ecosystem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 1464-1486.
- [41] OUCHI W 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esign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Mechanisms[J]. *Management Science*, 1979, 25(9): 833-848.
- [42] PADMANABHAN P, CHO R K. Decision Specific Experience in Foreign Ownership and Establishment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 25-41.
- [43] SANTOS D V, AFONSO O, VASCONCELOS P B. Individualism, Innovation, and Inequality: Exploring the Nexus[J]. *Economic Systems*, 2025, 49(1): 101252.
- [44] SHANE S. Cultural Influences on National Rates of Innov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3, 8(1): 59-73.
- [45] STOIAN M C. A Knowledge-based Perspective on SME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Choices and Chan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24, 30(10): 2488-2508.
- [46]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J]. *Research Policy*, 1986, 15(6): 285-305.
- [47] ZHAO H, LUO Y, SUH T. Transaction Cost Determinants and Ownership-based Entry Mode Choice: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 524-544.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Multinational's Entry Mod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JIAO Hao, ZHU Haoxuan, KUANG Minghui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country'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entry mode of MN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discuss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 constructed a sample of 11 380 observations across 112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tested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using multi-level mixed effects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ikelihood that an MNE will choose a wholly-owned entry mode, whereas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ordabilit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at likelihood. Moreov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ividualism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play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shaping the impact of host-country digital technology on entry mode choice. This research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NE's entry mode,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governments in building digitally friendly institutional ecosystem and for MNEs in selecting entry and governance modes.

Keywords: Host Country; Digital Technology; Entry Mode of MNEs; Na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 祝子白 刘建昌)